

# 守先待后,斯文在兹

——序“山东大学 110 周年校庆专刊”

徐显明

今年,历史悠久的山东大学已经走过了整整 110 个春秋了。抚今追昔,我们不禁心潮澎湃,感慨万端。其中最值得纪念和追忆的,无疑当是山东大学在学术研究领域的闪光足迹和辉煌成就。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,山东大学是以“文史见长”闻名于世的。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山东大学所享有的学术地位和学术盛誉是人文学科所铸就的。20 世纪 30 年代,以闻一多、梁实秋、杨振声、老舍、沈从文、游国恩、王统照、洪深等为代表的著名作家、学者在这里曾谱写过华美的篇章。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,以冯沅君、陆侃如、高亨、萧涤非、殷孟伦、殷焕先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和汉语言文字学,以丁山、郑鹤声、黄云眉、张维华、杨向奎、童书业、王仲荦、赵俪生为代表的中国古史研究,使山东大学成为当时海内外瞩目的文史研究重镇。以这些学者为依托的《文史哲》杂志,将山东大学的人文学术地位推向巅峰。直到今天,我们仍然受惠于昔日文史研究带来的学术声望。

山东大学的人文研究能够蜚声学坛,辐射海内外,首先是山东大学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地域优势使然。此即古人所谓地利。作为孔孟故里,山东素称人文渊薮。地处齐鲁大地的山东大学,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源头,被泽儒风墨雨,吟传稷下齐学余韵,又为汉代经学(郑玄)、魏晋玄学(王弼)、龙学(《文心雕龙》)、农学(《齐民要术》)等灿烂遗产所熏染,可以说是中国最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悠久学术渊源的大学。在这方面,山东大学堪称得天独厚。这一地缘优势,是国内任何一所大学所无法比拟的。

除却地理方面的先天因素之外,山东大学能够成为人文学研究的重镇,更与它长期积淀形成的学术特色和学术传统密不可分。回顾总结近百年间山东大学人文学科走过的辉煌路程,有以下三点特色或遗产,值得在此略加申述:

高度重视中国古典学术的研究是山东大学的优势和特色所在。这里的所谓古典学术研究主要指的就是古文、古史、古哲等传统学术。山东大学在这些领域的开拓和耕耘,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声望。古典学术可以说是山东大学人文研究的根据地、大本营和出发点。在文学方面,冯沅君、陆侃如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文学,代表作是《中国诗史》等;萧涤非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杜甫研究;在史学方面,王仲荦主攻魏晋南北朝史,是点校二十四史的功臣之一;杨向奎是以古代思想史、童书业是以先秦史研究著称于学界的。其他学科对史的研究,也多集中于古史。如吴大琨的经济史研究,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考察古史分期问题,其主要关怀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形态。在哲学方面,高亨的《周易》研究、先秦经籍研究就更不用说了。在法学方面,乔伟的《中国法制史》也主要探讨刑罚制度在历史上的不同形态。我们虽然也有关于近世学术的探研,如华岗的近现代革命史研究、郑鹤声的中华民国史研究,但山东大学人文研究的骨干和重心无疑在于古典学术。

具有海纳百川、兼容并包的开阔胸襟,是山东大学文科发展的宝贵传统。现代著名教育家蔡元



培为北京大学开创了“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的传统,但我以为,山东大学雅量高致,在兼容统合各种学统、学派方面可比肩于北京大学。山大在文科学统上的多元共生优势是国内其他高校所难以比拟的,这里有北京大学的学统,如冯沅君、陆侃如;有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统,如高亨、萧涤非;有章黄派的学统,如王仲荦、殷孟伦、殷焕先;有“古史辨”派的学统,如杨向奎、童书业;有“中研院”史语所的学统,如丁山;有南高的学统,如黄云眉、郑鹤声;有教会大学、特别是燕京大学的学统,如张维华;有马克思主义的学统,如华岗、赵俪生、吴大琨。开放性是山东大学学统谱系的显著特点,也就是说,民国年间所有的主要流派在山大都能据有一席之地,拥有各自的生存空间,这一点远比其他大学要开放得多,比如有的大学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容纳南高派的存在。各种学源竞争共存、和而不同、激荡互动,焕发出无穷的学术活力。百家云集、学派林立使得山东大学的人文研究能够一时独步学林,傲视宇内,就此而言,这一时期的山东大学堪称是当年稷下学宫的再现。

朴实厚重、精勤严谨、执著专注的学风,是今日山东大学文科最值得继承的遗产。受齐鲁文化朴实古风的影响,山大学者秉承前辈先贤那种“十年磨一剑”的精神,深谙为学须耐得住寂寞的真理,不为名利权位种种诱惑所牵引,不为功利浮躁的世风所裹挟,甘于青灯黄卷,皓首穷经。他们视学术如生命,一心只为往圣继绝学,笔耕不辍,终生不渝。山大学者尤其注重厚积薄发,瞄准尖端前沿,精心锻造传世之作,“不鸣则已,一鸣惊人”。历史学家王仲荦在研究工作中,恪守“良工不示人以璞”的古训,始终坚持高规格、高标准、高质量。其《北周六典》、《北周地理志》等书,在出版前四十多年就已草成,后经四次易稿,多次修改补充后,才陆续面世。文献目录学家王绍曾的学术青春,是从60岁后才开始的。他倾注十年心血主编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》,增补清人著述54880种,学界称赞该书“既为目录学上大盛事,亦有清一代文献括存之大业”,“堪称20世纪古典目录学领域中有关清代文献著录的压卷之作”。萧涤非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尤其是杜甫研究也体现出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的专注精神。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,萧涤非就胸怀杜甫研究的长远规划,从杜甫诗选注到对杜甫研究,再到“杜甫全集校注”,步步为营,层层推进,终于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高度。高亨的金石甲骨文字著作《金石甲骨文字通笺》也是积十数年之功而完成的巨制。正是在这种扎实严谨的学风浸润下,山东大学的人文研究、特别是文史哲诸科的研究,引领风骚,一时无双。

当下,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剧烈变革,与国内其他重点高校一样,山东大学的历史研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。如何重塑辉煌,是山东大学面临的重大课题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尝试,目前我们已选定人文研究新的突破口,寻找到一个新的增长点,这就是儒学研究。山东大学将以儒学研究为依托,提振和整合人文研究资源,努力打造成国内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平台。“山大特色,世界水平”的目标将有望在儒学研究这里率先实现。

人文研究曾是山东大学的骄傲和亮点,我们不能忘却这段辉煌的历史。值此110周年校庆之际,《文史哲》编辑部特邀请相关专家,对已故的为山大文科的繁荣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33位名流大师的学术成就进行一次集中盘点和展示。我认为,这是一个极具价值的创意,也是为110周年校庆贡献的一份厚礼!我希望,今日之年轻学子们在追慕和重温先贤业绩的同时,尤能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和巨大的动力,继往开来,推陈出新,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,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攀升,以迎来山东大学人文研究的再度辉煌!

(作者为山东大学校长)